

# 傅家文人的“正”能量



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

(上接B01版)

傅斯年也并未谋求仕途,而是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离开大陆。

虽然毛泽东赋诗予他,暗示傅斯年重新考虑政治取向。但第一次选择拥抱新时代的傅斯年,第二次在新中国成立时却选择了退缩。

这次,留学英国的侄儿傅乐焕对叔叔傅斯年倾向国民党表示失望。1949年,他不顾各方阻挠,毅然回国效力。遗憾的是,十年浩劫中,不堪屈辱的傅乐焕投陶然亭湖殉难,但他耿直和正派的学风被保留了下来。

## 傅氏学风的时代沉浮

400年后的聊城已不复黄河改道前的辉煌,有学者也为傅家消逝的文脉而感伤。

在古聊城,由于出了傅氏和邓氏两位“状元”,聊城的家家户户都颇为重视读书。

“我祖母从小就教导我父亲读十三经,还有其他的史学典籍。”傅氏后人傅尚奎回忆说。

有意思的是,在清代傅家近百位官宦当中,唯有家族第四支人才辈出,傅斯年就出自这支。

聊城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推测,古代家规都是长子长成,另立门户,而小子得以与父母一起居住,所受家族传统影响最多。

“傅氏家族第四支近代一直居住在‘相府’,培养出小‘秀才’,就不足为奇了。”高文广说。

不过,因科举而兴的傅家在清末民初科举制度终结以后,跟着衰落。即便如此,家族的教育积淀还是让傅家在当代出现了至少四位中国史专家,分别是傅斯年、辽金史学家傅乐焕,中西交通史专家傅乐淑以及傅乐成。

受益于祖父和父亲两代知名读书人教导的傅斯年继承了家庭勤学的传统,在历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而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傅乐成、傅乐焕和傅乐淑都受到叔叔傅斯年影响,日后也成为史学研究者,傅家这一支脉求学以用的新家学风悄然形成。

半个多世纪后,来自台湾的傅氏后人重回傅家先莹祭拜。傅尚奎得知,在台湾的傅家还有人继续从事历史研究,颇感欣慰。

鼎盛时曾是聊城四大家族之首的傅家,如今仍有几位傅家老人喜欢诗文书画。

在聊城傅家后人中,作为聊城大学化学系教授的傅尚奎是傅家子弟中学识最高的人,不过他却没有秉承傅家读诗习文的传统,而是选择了理科。

“我记得,以前祖母会教育父亲如何读书,但到了我父亲、母亲时,为了躲避批斗,父亲跑到了河北,母亲也无暇管我。”从小聪颖的傅尚奎笑着说,自己选择理科着实是受时代的影响,那时都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不过,虽然“文革”期间,自己

失去多个求学机会,但傅尚奎始终没放下勤学的家风。

一位傅氏后人说,“虽然家里现在没出大官,但还是有些有出息的孩子。”而傅尚奎透露,东北的傅家后人留美的经济学博士,“还有几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据说都学得不错。”

## “状元骑驴”的正能量

尽管文脉暗淡,但敦厚扎实的傅家人在聊城仍有着不错的口碑:“仗义执言,乐善好施”。

在家族内部,曾有傅家长者无钱下葬,族人便集资相助。在汶川和雅安地震中,远去东北闯荡的傅氏后人傅东坡还捐资上百万元赈灾。

66岁的傅尚甲说,“文革”一场,让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傅家后人难得重温傅家祖宗的言行,但家风传了下来。

“只知道祖上为人行善,高官不威,后人也这样秉持着,以至于聊城没有傅氏后人敢做蝇营狗苟的事,谁也不敢坏了祖先名声。”

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泉教授说,傅家在民国败落以后,在当地的影响力也日渐衰微。

不过,“傅阁老”的故事还在当地流传。作为清朝高官,傅以渐一直以平民的生活作风修身,“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与同朝显贵锦衣玉食、出行高头大马的生活完全不同。

傅以渐平时骑驴行走,顺治皇帝偶然看到,大笑不止,遂赐画轴一卷,题诗一首,其中一句“状元归去驴如飞”成为佳话。

而傅以渐教导族人与邻居礼让,和睦相处的“仁义胡同”的故事也在当地脍炙人口。如今,在聊城老城东关大街傅家祠堂旁,这条六尺宽的“仁义胡同”还悄然坐落。

傅以渐的品行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史料记载,傅家子弟科举做官,不仅个个政绩出众,而且个个为官清廉,秉公勤政,多人卒于任上。

对于傅以渐留给子孙们的政治品德,早在他考取状元时的殿试答卷中便有显露:“正朝廷可正百官,正百官可正万民”。晚年,傅以渐认为“政就是正”,提出从朝廷、百官到万民,自上而下,都做到正。这种理念在当时不可谓不大胆。

傅斯年同样秉承了刚正的政治品性,对腐败行为猛烈抨击,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被他从行政院长位置上赶下台,人们也送他“傅大炮”的绰号。

在今天,“刺头”也时常被拿来形容傅家人的耿直和仗义。“我们都是有啥说啥,直来直去,看不惯的事情就会说一管,管一管!”傅家后人笑着说。

(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李泉、聊城大学教授范景华、聊城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对本文亦有贡献。)



部分在聊城的傅家后人与傅氏家族研究者合影。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摄



聊城傅斯年陈列馆。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摄



聊城老城东关大街傅家祠堂旁的仁义胡同。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摄



聊城傅氏先莹图。(山东大学供图)



聊城傅氏先莹遗迹。(山东大学供图)

世家春秋

## 傅氏家族大事表

顺治三年(1646) 傅以渐考中状元,任内翰林弘文院修撰。

顺治十二年(1655) 傅以渐任《圣训》总裁官,加“太子太保”,御赐“状元骑驴图”。

顺治十五年(1658) 傅以渐任会试主考官,加“少保”,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后部尚书。

康熙三年(1664) 傅以渐病逝于家乡聊城。

康熙三十九年(1700) 傅以履任柳州府知府,次年任太平府知府。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傅圣揆考取拔贡,后任金溪、建安知县。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傅永祥中举,后任瑞金县知县、诸城县教谕。

雍正七年(1729) 傅廷珠举拔贡,后任遂宁县知县。

乾隆十七年(1725) 傅永缙考取举人,初任平阴县教谕,后任台州府同知。

乾隆三十年(1765) 傅兆林考取武举人,后任卫领运千总。

嘉庆十年(1805) 傅京辉考取进士,历任萧县、巴县知县。

嘉庆十三年(1808) 傅文彬为钦赐举人,钦赐国子监学正。

嘉庆十八年(1813) 傅绳勋考取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江西巡抚、江苏巡抚等职。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傅浚考中进士,后任吏部主事。

咸丰三年(1853) 傅斯悻中举。

同治元年(1862) 傅溥考中举人,任右翼宗学汉教习。

同治二年(1863) 清军收复嘉善,傅斯悻组织战后事务。

光绪九年(1883) 傅斯悻代理湖州知府,后赴天津总办海运。

光绪十二年(1886) 傅斯悻代理杭州知府,不久,卒于任所。

光绪二十年(1894) 傅旭安考中举人,任东平龙山书院院长。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傅斯年出生。

摘自《聊城傅氏家族文化研究》

研究者说

李泉  
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



## 傅氏家族没有沽名钓誉的人

家学家风是文化家族的灵魂,是家族文化的精髓。所谓家学,唐宋以后,更多地体现为家族的文化认同及价值体系的建立。就聊城傅氏家族而言,其家学家风的显著特点是科举入仕,廉洁为官。

作为傅氏家族的杰出人物,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政治品德和行为方式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家族中逐渐形成了科举入仕、勤政爱民的风气。清

一代,傅氏子弟习儒读书,不是为谋生,也不是为了传承学问,终极目标是入地方学校为生员,进而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为官,这是其家族文化的价值取向。

明清时期,许多官员虽无才学,但也总要附庸风雅,或吟出一些无病呻吟的诗句,或写一些不痛不痒的议论文章,或跟在考据学家屁股后头学几句貌似内行的词句,刊刻印行,大肆张扬。傅氏家族中没有这种沽名钓誉

的人物,他们无不秉承傅以渐的遗训,清廉谨慎,尽职尽责地做官,不醉心荣誉,更不贪图钱财。至民国年间,傅以渐的七世孙傅斯年没有再选择入仕为官的道路,但却把这种清正廉明、正直敢言的家风发扬到极致,为别人所不也为,言别人所不也言,完全不顾蒋介石的面面,成为知识分子“时代良心”的代言人。

致力科举入仕,入仕后当好官,这是傅氏家族的传统,是其

家族文化的价值判断。清代傅氏家族成员没有什么像样子的著作、作品流传后世,但是丝毫不影响这个家族的文化地位,学优则仕,积极行政,廉洁爱民,这种家学家风,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我们重视一个家族以学术思想、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家学家风的研究,也不可忽视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审视弘扬家学家风中优秀的文化传统。